

2017 年工作简报第三期

学术讲座.....	2
汉语哲学与宗教工作坊系列讲座（第 23 场）	2
爱智园学术沙龙（第四场）	3
“如何使思维减少进入误区？”讲座	5
学术会议.....	7
《延长的万物之尺——计算科学、经验主义与科学方法》中 译本发布会会议.....	7
京师哲学工作坊.....	14
汉语哲学与宗教工作坊	14
科研成果.....	18
2017 年第三季度中心主要科研成果	18

学术讲座

汉语哲学与宗教工作坊系列讲座（第 23 场）

2017 年 6 月 17 日晚上，应我院瞿旭彤副教授邀请，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赖品超教授在主楼 A802 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此次讲座以“从演化论与儒家反思基督教的宽恕与和解”为题，对基督教的宽恕与和解概念进行了解读和反思。本次讲座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宗教与文化研究所主办，来自哲学学院的刘孝廷老师、文学院的杨俊杰老师以及多位学生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讲座开始的引言部分，赖老师指明了基督教信仰中的宽恕与和解概念在人类社会、特别是族群间关系上的重要作用，并由此提出将要探讨和解决的关键问题：基督教那种看来是建基于上帝与人的关系的对宽恕与和解的神学论述，与在公共领域中有关族群间的和解的讨论有什么关系？基督教应该如何介入公共领域的讨论？

以无条件的宽恕为切入点，赖老师首先从演化论的观点谈起，认为演化论的研究一方面强调宽恕对和解及建立和平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宽恕本身的限制。接着，赖老师从儒家的角度看宽恕和人性，认为儒家所强调的“恕”一方面肯定了冲突是有可能经过融情与沟通对话而得到解决；但另一方面儒家对无条件的宽恕和以德报怨却是有所保留的。由此，赖老师引出对基督教人性论的反思。他认为，在宽恕与复和的问题上，相较于儒家和演化论，基督教似乎比较注重宽恕、特别是无条件的宽恕，但它对达致复和及建立和平的策略，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较“天真”，基督教需要有更加平衡辩证的人观：“人的同情心使宽恕成为可能，而人的自私倾向使报复成为必需。”

赖老师强调，在宽恕之外，基督教神学也需要重视解放和公义等主题，这并不是否定基督教讲的宽恕对于复和和建立和平的相关性或贡献。在公共领域中，为了达致和解及建立和平，基督教的宽恕应辅以对真理和公义的要求而做出平衡，并且重视修复式正义与坦诚公开的道歉对和解的必需性。

在提问环节，赖老师与在场的校内外老师和同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家针对“上帝的救赎观”、“和解”、“和解的策略与尺度”等问题与赖老师交换了意见。通过此次讲座，加深了同学们对基督教“宽恕”与“和解”概念的理解，促进了我院与优秀学者的交流合作。



爱智园学术沙龙（第四场）

2017年6月28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举办的爱智园学术沙龙邀请我校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副教授瞿旭彤博士，进行了题为“巴特与康德：以巴特的宗教批判为例”的讲座。讲座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B805举行，由李绍猛副教授主持，刘鑫博士评论。此外，二十余位来自校内外的本、硕、博同学和其他人士也参与了此次活动。

在这次讲座中，瞿老师主要跟大家分享了他计划写作的第二本学术著作《巴特与康德》的一些基本思路，并且试着以巴特宗教批判为例作一初步的具体说明。亦即通过考察巴特对康德的接受与批判，重新审视卡尔·巴特本人如何在借鉴康德的同时又穿过或超越了康德。讲座首先从对巴特的一般介绍展开。瞿老师指出，在二十世纪的思想史上，作为神学家的巴特来自于瑞士德语地区的改革宗传统，其影响超出德语基督教界，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界都有广泛影响。不仅如此，作为重要的神学思想家，巴特甚至被天主教教宗庇护十二世称作“阿奎那以来最重要的基督教神学家”，他的思想也在哲学界受到了很多重视。无论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对巴特思想的激赏，还是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借助巴特思想对“他者”概念的发展，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

使得巴特可能和康德联系起来的第一个理由，在于康德本人的宗教思想。瞿老师指出，康德出生于热忱的虔敬派家庭，而且至大学为止一直受到新教虔敬派的教育。即使康德后来刻意与教会的宗教生活保持距离，但其理性批判的框架并未否定神学，反而对现代神学的发

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现代神学摆脱了古典经验主义的束缚，并且维护了宗教信念的合理性。因此，是否有可能把康德理解为“更高级的虔敬派”，是否可以把康德的道德哲学理解为一种基督教信仰的现代表达，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当然，这并非对康德思想的宗教维度研究，而是以神学和宗教角度重新诠释康德思想的尝试。

这一尝试，在我们把握巴特思想的过程中更能看到其必要性。在巴特思想形成的过程中，康德哲学扮演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无论是巴特本人的评论，还是其档案馆的康德藏书，这些传记性的事实都值得在思想层面得到重视。而且，考虑到巴特三十年代的主要论断：“一贯的理性自主论、对启示的耍弄、人性的界限”等命题，我们毫无疑问可能看到康德哲学的影响。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学界或者贬低康德的影响，或者强调新康德主义对巴特的影响。瞿老师则沿着美国巴特学者 Bruce McCormack 的路径，认为巴特神学有两个前提：一方面康德的认识论，一方面是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而沿着这两个前提，瞿老师试图说明，巴特不仅仅如 McCormack 所说的是一名康德主义者，而更应该是一名后康德主义者：“巴特一方面接受康德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另一方面在实际上试图重构一种后现代的，具有实质神学内容的形而上学”。

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瞿老师提出了此书的工作假设，即巴特的神学可以借助他对康德神学-哲学的批判性吸收来解读，但一解读必须借助于一种后现代式的对亚里士多德传统形而上学的复兴。由此，此书的核心问题并非康德和巴特的比较研究或者影响研究，而是关注巴特思想不同时期对康德的诠释，从而考察巴特自身思想的特质和发展。康德对巴特最大的影响，简言之可以理解为对人和上帝界限的确立，即一种变形的理性界限论。由此出发，巴特拒绝阿奎那式的类比（同比）方案，强调人的理性无法把握上帝。但与此同时，借助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传统，巴特强调认识对象本身的主动性，故而不是人的理性如何建构信仰的客体，而是信仰对象的自我彰显。在这个意义上，正如 McCormack 所说，巴特试图穿过康德，构建自己的形而上学体系。进一步，瞿老师又指出这一体系本身的后现代特性，集中体现在其对“潜能”、“新”、“差异”、“在路上”等概念的使用上。至于此项关注和研究的工作方法，主要是历史-生成的、以及哲学-神学的，也就是说，通过考察巴特本人的康德阅读史和诠释史来发掘其思想和文本的生成过程，同时在哲学和神学的方法下针对一些具体的重要问题集中进行阐释。

在讲座的最后，瞿老师举例展示了一个论证的片段，即康德对“扬弃”（Aufhebung）概念的使用。康德并非限制或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相反，应当理解为，康德扬弃知识，为的是能够向信仰得到空间。以类比的方式，瞿老师给出了自己对巴特宗教批判的诠释，即

“扬弃宗教，从而向上帝的启示和信仰得到空间”。从此，我们可以管窥巴特神学对康德批判哲学的借鉴与挪用。

最后，李绍猛老师和刘鑫老师分别对讲座提出了精彩的评议和专业的问题，同学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问题。瞿老师一一加以回应，并表示此书还在准备阶段，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论证；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问题和与讨论无疑有助于澄清某些模糊和有待澄清的问题。而与会的同学也表示学到了很多关于巴特的思想，以及对康德解读的不同可能性。在热烈的掌声中，此次学术沙龙圆满结束。

“如何使思维减少进入误区？”讲座

2017年9月22日下午3点，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教授邀请，深圳市政协原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现任参事周长瑚在教四 101 做了题为“如何使思维减少进入误区？”的讲座，来自校内外的 100 多位老师和同学聆听了周先生的讲座。本次讲座由哲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向东教授主持。



简单的开场后，周先生便开始了此次讲座。他从一个简单的问题着手进入了讲座的主题：为什么当下社会有很多流行认识、看法是不对的呢？他认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受他人意见的误导、依据不充分的手段做出错误的判断、知识不足导致没有能力做出正确判断、由于焦虑等负面情绪影响了人的正常思维、欲望的驱使等。这也是人们的思维之所以会走向

误区的主要原因，换言之，即是非判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因此，走出思维误区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明确明辨是非的主要原则和方法：科学和公正。

周老从概念定义及案例分析两方面详细阐述了科学与公正两个原则。周老十分重视对于“理”字的追求，因此非常注重观念的正确以及概念的清晰，对于不同的问题首先从建立定义入手、明确概念，再确立正确的观念，逐步展开到具体的问题解决中。此次讲座中，他对于什么是科学、真理、艺术、理论、因果关系、预测、素质、公平、正义、文化、文明等多种概念进行了分析，并跳出原有的认识，分别重新定义或明确概念或进行确切的解读，呈现新意，突显其本质和准确的内涵。他还通过具体事例加深听众对于概念定义的理解，如通过举例正负电荷、相对运动等物理学概念来进一步说明矛盾问题，从而进一步说明公平正义并不是个体无差异，而是承认差别、区分差别，照顾差别，通过差异保持秩序的稳定。



周长瑚先生的演讲生动且深刻，获得了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和认同。在之后的自由提问环节，听众们纷纷举手发言，其中 17 级马哲专业博士田立鹏、16 级马哲专业硕士朱一凡以及校外人士对于“如何判断已经进入思维误区”的问题与周先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在讲座最后，吴向东院长对于周先生的讲座内容进行了总结和回顾。他指出，周先生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依然思路敏捷、充满激情，其对于如何走出思维误区的理解来自于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实践，因此在讲述时能够如此的发自内心、娓娓道来。此外，周先生的讲座由浅入深，其对于科学与公平正义的深刻分析实则反映了哲学中对于真理与价值之间关系问题的理解。



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周长瑚先生的讲解风趣幽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广大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收获良多。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学术会议

《延长的万物之尺——计算科学、经验主义与科学方法》中译本发布会会议

2017年9月8日上午8:30-12:00，国际知名科学哲学家 Paul Humphreys 教授的代表作之一 *Extending Ourselves*（《延长的万物之尺——计算科学、经验主义与科学方法》，下称《延长的万物之尺》）中译本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举行。本书作者 Humphreys 教授，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哲学系教授，曾任美国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席，美国哲学学会国际部主任，弗吉尼亚大学哲学系主任等，兼任国际著名杂志 *Synth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等编委，近年来尤以其在科学哲学以及有关突现的认识论研究、计算机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闻名于欧美哲学界；此次受北京师范大学“短期引智项目”邀请，参加“复杂性与突现”国际工作坊暨当代科学哲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活动，并莅临本场发布会。参加发布会的还有本书的译校者、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大学等单位的学界同仁 20 余人。



首先,本次活动的邀请者也是本书的校者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董春雨教授介绍了本书翻译的来龙去脉。董春雨教授 2007 年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作访问学者,受教于 Humphreys 教授。2008 年回国之时,即与 Humphreys 教授相约,欲将 *Extending Ourselves* 一书译为中文版,后来由于出版资金不到位、出版方变更等原因,几经周折,延至今日才由人民出版社付梓面世,可谓十年磨一剑。

董春雨教授指出,《延长的万物之尺》英文版出版虽然已有十三年之久,但它讨论问题之重要、分析问题之深刻、理解世界之独到,充分展示了一位科学哲学家的深厚功底和独特价值,尤其是在多年之后回溯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更能显示出作者思想的深邃、洞见和超前。例如,就观察而言,从肉眼到科学最初使用的望远镜,再到如今巡天的射电望远镜,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从认识的中心似乎退到了一种越来越无关的境地,此即科学认识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化,这一立场的改变发人深省,涉及到我们对实在的理解。另外,早在计算机面世不久,Humphreys 教授就开始关注计算科学的哲学问题,关注数据问题。在本书中,他一开始就提出了“海量数据”的获取和处理问题,其实质就是今天人们津津乐道的大数据问题;更为重要的,他的思考已经延伸到哲学层面的“数据的不透明性”等问题,它对于深化人们关于世界的本质问题的认识,深化人们有关计算、数据、心灵性质的认识,尤其是深化人们关于大数据方法的限度与意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这充分反映了 Humphreys 教授深厚的学养和学术洞察力与远见,包括他能够从寻常现象与知识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讨论问题的方式,也都值得学界后辈们认真体会。

随后,董教授简单谈及了 *Extending Ourselves* 的翻译过程的点滴体会。他说,为了完成

高水平的译著，译校者对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从专有名词中文译法的定夺，到字斟句酌的细致推敲、讨论，可谓费尽心力，备尽艰辛。好在主要译者苏湛专业知识背景和语言功底扎实，且富有文采，有时又灵感乍现，得来传神妙笔——仅书名的转译便可窥见其翻译的精妙之处。当然，此书翻译的评价最终取决于学界的检验；而有所纰漏甚至错讹，想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好在大家尽心尽力，纰漏皆因学力不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了。最后，董教授由衷地感谢人民出版社对中译本出版的大力支持。

接着《延长的万物之尺》一书的作者 Humphreys 教授进行了发言。他首先感谢董春雨教授的诚挚邀请，并谈及了多年来他们在学术交流上的强烈共鸣和志同道合的珍贵友情。继而，他也特别感谢了中译本的主要译校者和出版方奉献和辛劳。最后，他谈了关于本书论题的几点最新的想法。他认为，传统经验方法对于今天的科学研究而言并不十分有用，他更倾向于将计算科学（Computational Science）作为思想资源来重新看待科学和世界及其关系。此外，他还谈到了一些启发他很早就关注那时普通人还无法理解的数据现象和有趣思想等，指出“计算模板”是一个崭新的概念，对于理解他的理论至关重要。最后，他也简单谈到了这种思想在当前大数据研究上的延伸，介绍了最新的有关“大数据的不透明性”论文的主要观点。



Humphreys 教授发言结束后，刘孝廷教授谈了他对《延长的万物之尺》的看法。他指出，Humphreys 教授是一位极富洞察力和高悟性的学者，即在有些问题还没有全面展开之时，他就能迅速抓住问题的根本，并将研究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即切入到许多大家共同逼近的一些相似的重要问题，从而获得多重启发。从研究方法上来讲，这是非常富有启发性的。最

后，刘教授感谢 Humphreys 教授和人民出版社的杰出工作，为中国的学术界共同注入了一阵清风。人民出版社的责任编辑胡喜云代表人民出版社做了回应，她很感谢学界专家对出版社工作的认同，并为出版社能够出版《延长的万物之尺》、传播学术思想而感到自豪。她希望双方的合作能够进一步深入，如提高同行推介和网络宣传的力度等，继续为国内学术界的发展做出贡献。

此后，参加此次发布会的译者、作者、学界同仁和出版方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难忘的时刻。



继前面简短的发布会之后，主要译者苏湛教授以“关于《延长的万物之尺》”为题做了精彩报告。报告分导言、正论、余论和讨论四个部分。

在导言部分，苏湛教授讲述了《延长的万物之尺》译名的由来。他提到在新华书店闲逛之时，受到图书分类的启发，对译名进行了初步思考。随后，由 *Ourselves* 出发想到了人类，而人类与认识论是相结合的，于是他想到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经典名言。继而，由“尺”生发出了“延长”的想法，便有了“延长的万物之尺”。但是，鉴于 *Extending Ourselves* 是点题之笔，而“延长的万物之尺”的提法失去了点题的意义，所以他强调了“延长的万物之尺”是指得到延展的人类认识能力。

在正论部分，苏湛教授首先表达了他对译文准确性的自信，继而从纵、横两个方向简要介绍了本书内容。在纵向上，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二章主要讲述了科学仪器对人类感官能力的增强，强调科学仪器的作用。而第三章到第五章则主要讲述了计算科学对人类计算和思维能力的增

强，强调了本书的核心——计算模型。在横向上，本书主要讨论了两个主要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和计算模型理论。在接下来的报告中，苏湛简要介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着重介绍了计算模型理论，力求准确传达 Humphreys 的思想。

就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而言，苏湛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涉及到的议题是人类认识对工具的依赖，这里的工具包括仪器，手段（如实验手段、数学工具、数学语言、计算机技术等）。苏湛认为人类对工具的依赖从一开始就有，科学史上最早可以追溯到伽利略时期对实验科学和数学工具的依赖。因此，可以说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始终是一种幻想，只不过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而已。那么，工具是怎样延展人类的认识呢？苏湛指出 Humphreys 一开始提到了观测仪器，但不限于它，因为还有计算技术和数学工具。基于此，苏湛引入了书中仪器对于人类认识的三种增强方式：外推（Extrapolation）、转换（Conversion）和益增（Augmentation）。其中，外推和转换的译法争议少，而益增是新词，争议较多。就三者的含义而言，诚如其名，外推是指相同感知方式下对现有感知能力的延展，如使用望远镜、显微镜等仪器。转换是指将一种感知方式转换为另一种，如使用声纳。益增是指一些物理量很难通过感官直接感知到，但可以通过工具实现，益增之益在于增加了感知能力的种类，例如对磁力的感知可借助指南针实现。除了提及人类认识对工具的依赖之外，苏湛还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认识论还涉及到可见与可处理和不可见与不可处理之间博弈的议题，指出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其中可见的标准是个人化的，故可见与不可见之间也没有明确的边界。虽然人类可以借助于工具打破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狭隘划分，扩展人的认识能力，但是我们依然得承认认识的不透明性。苏湛指出认识的不透明性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并不是计算机模拟技术的缺陷，鉴于此，未来的处理方法只能是将人类从认识论中心拿掉而不是一味地突破人类的认识缺陷。

就计算模型理论而言，苏湛指出《延长的万物之尺》中有三个核心概念：理论模板-计算模板-计算模型。三个概念层层推进，理论模板是基石，是指一组表征变量间关系的符号通式，我们可在类比的意义上将它简单理解为库恩的符号通式。理论模板配上可解的偏微分方程即是计算模板，它是理论模板的一个计算上可处理的替代个例。更进一步，将计算模板应用于具体现实问题所得到的形式化对象就是计算模型。因此，在实际应用中，理论模板、计算模板和计算模型是不可分离、息息相关的。进而，就它们各自的特点而言，理论模板的数学结构是先有的，普适性强，是纯形式对象，完全抽离了经验现实内容，不表征任何物质对象。当把理论模板变成计算模板时，便要求得到一个可解的方程，若得不到，可进行理想化。因此，计算模板是介于经验和纯形式化之间的。例如，牛顿第二定律可配上边界条件，转换为

可解方程。需要强调的是，理论模板的语构并不决定计算模板的语构。继而，把计算模板映射到现实中时，就得到了计算模型。在这里，为了让理论模板去表征具体的问题，所以要建立起假设，即“建构假设(Construction Assumptions)”，这不同于波普尔他们使用的 Hypothesis，它可以反事实，用以增加计算模板的可解性。换言之，如果发生与观测结果不符合的情况，要考虑如何调整模板的方案而不是完全放弃模板。在本书中，调整的方案被称作“校正集(Correction Set)”，它是一系列调整建构假设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有“诠释(Interpretation)”即试图对方程的物理意义进行诠释，“初始正当性论证(Initial justification)”即为特定计算模板为何能适用于某一物理过程做辩护，“输出表述(An Output representation)”即以特定的形式输出结果，也可以理解为表征，它是计算模型中很重要的部分。所有这些术语都是计算模型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模板通过建构假设、校正集、诠释、初始正当性论证等，映射到一个现实的研究对象上，从而实现对对象的表征。因此，无论从内容上还是特点上来看，Humphreys 的计算模型理论都是一套全新的解释方式，它以求解为目的，试图为数理科学提供一种可靠、操作性强的研究范式。

在苏湛看来，计算模型最聪明的部分在于模板本身是纯语构的，而模型是指称现实的。这样，若用模板解决现实问题，它就必须成为一个模型。加之，Humphreys 认为模板是通用的，但每次应用又是独立的。基于这些，可以把物理问题归为一类，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要单独建立相应的模型。

为了更加清楚的介绍计算模型，苏湛就计算模型的特性、计算模型与其他理论之间的区别分别做了详细说明。苏湛指出计算模型具有：诠释的不可分离性（诠释是贯穿于全程中的）；建构假设的反事实性（为了保证可解性，用选择性实在论的立场来为反事实性做辩护）；正当性论证内建于建构过程；模板的非充分决定性，即模板与现实指涉之间的分离，它包括语义非充分决定性（同一套模板可以做不同诠释，保证了模板的跨学科应用）和语构非充分决定性（同一过程可用不同模板表征，如地心说与日心说基于不同的参照系解释天体的运行轨迹）；模型的建构的过程可以按任意路径进行（如同一个物理问题可用归纳、演绎、类比分别建立模型）。就计算模型理论与之前理论的区别而言，它的研究目的定位是解题，符合常规科学的特征；它坚持选择性实在论这一有利于解题的实在论立场，而不是给出一个清晰的、完整的本体论承诺；区别于库恩的符号通式，它强调失效后的调整，在它背后的是正当性论证；它把对科学进步的解释拉回到了科学是由微小的进步推动的轨道上，重视常规科学；在分析单元上，它强调将同一模板映射到不同的学科领域，例如薛定谔用物理学的模板解释生物学。而之前的理论、范式和研究纲领是主题和学科特定的，不能随便的映射到不同的学科

上。基于上述介绍，苏湛认为计算模型理论完全可以和库恩、波普尔的理论相媲美。

最后，在余论中，苏湛指出 Humphreys 的研究唤起了重新分析常规科学的重要性。此外，在实践上，计算科学也能够带给哲学新的启发。其三，语构直接影响到一个计算模型是不是可解，应该予以重视。例如，实验主义者询问的做理论科学能否提出新东西的问题就是一个语构问题，是使世界从一个不可理解的语构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语构的问题。其四，科学认识对于科学工具和数学语言的依赖是不容忽视的。

综上所述，苏湛认为 Humphreys 的计算模型理论是解读科学活动的一种新框架，但它只适用于数理科学，无法为实验研究工作提供解释。苏湛认为 Humphreys 的原型是计算机模拟，即首先有固定的几组数学公式，继而用它们来诠释不同的物理事实。他指出立足于计算机模拟，反过来，从计算机模拟倒推到现实的实验或许是将来可以发展的一个问题。最后，他再次强调了 Humphreys 的计算模型理论核心在于求解，但难以为大自然终极图景提供解释。

在讨论环节，苏湛问 Humphreys 计算模型理论是否适用于实验？Humphreys 认为不是，他指出对于理科来说，完全抽象的模型可以应用于很多领域，但实验研究中所采用的实验手段具有特殊性，很难在不同的学科间进行交流。除此之外，Humphreys 认为波普尔的证伪理论专注于科学的消极方面，而把在实验中无用的模型完全抛弃掉是不合理的，因为理论一开始就是不完美的，他主张对失败的理论进行修正而不是放弃。此外，Humphreys 认为库恩更加强科学革命中的断层经验，但常规科学是连续性的，他更强调这一点。因此，相比于波普尔和库恩，Humphreys 的计算模型理论都较为温和。

当被问到电脑模拟算不算实验时，Humphreys 认为电脑实验不是实验，因为实验是建立在一系列原则基础之上的，对于数理科学十分重要。Humphreys 询问苏湛科学史中有没有运用计算模型的例子，苏湛指出开尔文勋爵用一组方程（最初从热力学和流体力学中用演绎方法得出的方程）去解决电磁学中的问题，赋予了电磁学问题以数学的语言。他也希望科学史中可以发掘出更多相关的例子。

此后，Humphreys 和苏湛讨论了计算模板与库恩的符号通式之间的不同，苏湛指出他只是在类比的意义上，将二者等同，便于理解。但其实二者在意义上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二者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计算模板是可改造的，但符号通式是可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绝的。

在谈到常规科学中的连续性时，Humphreys 提到了不同层次的计算模板，他认为计算模板是分层次的，有些是通用的，有些是专用的，需要加以区分。

当被问到计算模板与计算模型之间的差别时，苏湛回应道，计算模板是抽离了数学部分，不指涉任何实在的，但用计算模板研究具体问题时，它就成了模型，要指涉物理实在。此外，

模板可跨领域使用，合法性在于每一个应用本身的独立性与特性。模板与模型之间的这种抽离绕过了传统模型经常会遭遇到的窘境。刘教授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区分，认为计算模板与计算模型的区分相当于计算机工作的原理，且这个问题只有在计算机时代才能得到回答。他指出，在人机时代，人的认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最后，在被问到模型的跨域使用，跨域的界限在哪里？能不能跨到社会学科？Humphreys认为关键要看世界本身是什么样子的，这是很偶然。苏湛认为这取决于建构的过程。在这些讨论交流之后，“当代科学哲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圆满落幕。

京师哲学工作坊

汉语哲学与宗教工作坊

2017年6月9日至11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和辅仁大学哲学系联合主办的第三次“汉语哲学与宗教工作坊”，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楼A802教室成功举办。此次工作坊由北京师范大学瞿旭彤老师和辅仁大学曾庆豹老师联合主办，与会学者分别包括：艾菊红（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勇（上海交通大学）、丁辉（中山大学）、江庆心（中国人民大学）、唐文明（清华大学）、伍伟亨（香港浸会大学）、肖剑（中山大学）、杨小刚（中山大学）、Alex Yeung（Pontifical Athenaeum Regina Apostolorum）等。此外，来自京内外各所高校的多位学者和二十余位本、硕、博士生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本次工作坊以研讨会的形式开展，主题为研读和讨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思想史经典著作《自我的根源》（*Source of the Self*）第5-21章，由陈勇、杨小刚、曾庆豹、瞿旭彤、丁辉、肖剑和伍伟亨老师先后领读文本，并针对具体文本和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工作坊活动于6月9日正式开始。在两位主持人阐明工作坊宗旨和参会者进行自我介绍后，Alex Yeung教授概要地介绍了泰勒的生平、主要思想、以及《自我的根源》第1-4章的主要内容。随后，第5-21章的领读和讨论正式开始。

首先，陈勇老师领读第5-6章的内容。第5章《道德地形》着重介绍了泰勒关于自我的现代概念（“内在性”，inwardness）、以及自我与道德本源的定位（“道德地形”，Moral Topography），并且交待了泰勒本书的主要意图，即弄清我们“奇特和异常”的有关内在和外在的现代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第6章《柏拉图自我控制》着重介绍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道德理论。柏拉图讲道德根源定位于思想领域之中，由此推动和设立了“我们的文明中占统治地位的那组道德理论的形式”，即，“成为理性的确实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道德自我

的集中和统一”乃是朝向现代的内在化的前提，但并非内在化本身。柏拉图的道德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在西方占据了统治地位，基督教神学吸收了很多柏拉图的思想，但是基督教强调意志的彻底转变的思想却无法与柏拉图哲学相结合，基督教甚至认为理性是恶的仆人，基督教神学对于古希腊哲学的抵制是很多现代反理性主义哲学的先驱。

接着，杨小刚老师领读第 7-8 章的内容。第 7 章《内在之人》着重介绍了奥古斯丁与柏拉图哲学的渊源。泰勒认为，奥古斯丁是从柏拉图通往笛卡尔的节点。奥古斯丁将精神 / 物质、高等 / 低等、永恒 / 有时等对立转化为内 / 外的对立，这是与柏拉图不同的另一种版本的二元论。内在转向是奥古斯丁思想的关节点，心灵通过内在转向，记起上帝，奥古斯丁吸收柏拉图的学说赋予这一圣经语言以新的含义。奥古斯丁由此引入了“彻底反思的内在性”，把自我转向了第一人称的向度。第 8 章《笛卡尔的分离的理性》着重探讨了笛卡尔的思想，笛卡尔的“我思”虽然也是证明上帝存在的起点，但主体的思考具备自足的确定性，上帝存在因此成为追求科学的一个阶段而非其基础，向内的探寻不再是与上帝相遇，而是获得确定且清晰的自我认识。领读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意志转向”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第 9-10 章的内容由曾庆豹老师领读。第 9 章《洛克的点状自我》着重介绍了泰勒所称之谓的洛克的“点状”自我——分离的和理性的主体，分离是一种客观化的动作，所以其结果也就体现在一种秩序，一种自我展示的秩序，洛克把心灵具体化，接受心灵的原子化，于是我们对事物的理解都是简单的观念的建筑和形成，客观化即指内在秩序的外化，具体化使控制得以可能。第 10 章《探索“人类条件”》着重强调了蒙田的个人的特殊性，他的转向内在不是转向理智与秩序，而是突出特殊性，这种不寻求普遍的个性化更为深刻地介入了内在，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化反省和自我解释。领读结束后，与会学者就“分离”、“蒙田的非理性的特殊的‘我’”、“忏悔是自我探索还是自我表达”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第一天的阅读由瞿旭彤老师领读的第 11-12 章而结束。第 11 章《内向性》在总结前文早期现代个人的两个重要侧面“自我负责的独立性”和“被认识到的特殊性”后，提出第三个侧面——“人格承诺/全人委身的个人主义”，并且具体论述了现代认同在最近两个世纪形成的三个特征：“现代区位化”、“(政治的)原子论”和“人类的创造性(poetic)能力”。第 12 章《关于历史说明的题外话》，着重表达了泰勒对于现代认同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和自我辩护，这一研究既不是历史性的因果解释，也不是唯心主义的论述，而是一种阐释。泰勒认为，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阐释性的问题上，并试图以其各个阶段的形式表达现代认同。领读结束后，与会学者就“阐释(interpretation)和说明(explanation)的区分”以及“观念和实践接触的方式”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工作坊第二天的活动由丁辉老师领读第 13-14 章开始。从第 13 章《上帝喜爱副词》开始，泰勒试图探究现代的本性观的产生、及其在对日常生活的肯定中的根基。对日常生活的肯定，表现为以往伦理等级秩序的颠覆。这样的肯定有着神学起点，历史的起源在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传统，上帝作为创造者，自己肯定了生活与存在：“神看着是好的。”第 14 章《理性化的基督教》追溯的是日常生活的肯定对于现代认同的塑造性影响。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容是日常生活伦理与分离性的自由和合理性的哲学的融合。泰勒认为，洛克是这一阶段的关键人物，其思想是这一综合的最早体现，洛克的合理性的宗教从虔诚地为了上帝而生活的问题变成了有理性地生活的问题。领读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洛克思想的重要性”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接着，由杨小刚老师领读第 15-16 章的内容。第 15 章《道德情感》讲述了洛克自然神论的一个对立面，即由第三任 Shaftesbury 伯爵 Anthony Ashley Cooper (1671-1713) 所奠定的、由 Hutcheson (1694-1746) 所发展的道德情感学说。Shaftesbury 到 Hutcheson 的自然神论和洛克的自然神论有重叠之处，差别在于人在整个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洛克的机械论主张分离的理性对世界的工具化利用，而 Shaftesbury 和 Hutcheson 尽管没有否认分离的理性，但认为我们人能恢复内在的向善天性，从而重新参与上帝的计划。在 17 世纪上半叶，这一差异尚未显示出重要性，但随着卢梭和浪漫派的出现，成为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对立。在第 16 章《天意秩序》，泰勒认为，“18 世纪的自然神论是通往反宗教的启蒙运动的一个阶段”的这种观点有误导。他强调自然神论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力量。自然神论者崇敬的秩序有了完全不同的形式，秩序不再是一个表达了或者内嵌了意义的秩序，而是世界内事物的自然协调 (mesh) 构成一个和谐整体。这副看起来传统的有机论的、目的论的秩序图景现在以效果因的形式表达出来，不再有以往的本体论的地位，但这种新的秩序观也能为道德和社会秩序提供基础。

第 17-18 章的内容由肖剑老师领读。第 17 章《现代性的文化》概要考察了 17、18 世纪哲学范畴之外的其它领域的重大变化，包括对商业的新评价、小说的兴起、对婚姻与家庭的不同理解，并得出总结：自然唤起我们之前被控制的感情；我们自己的本性受我们的内部冲动和我们于内在联系整体中的位置所规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感情可能具有古代哲学不可能允许有的价值。在第 18 章《断裂的视野》中，泰勒首先为自己使用的方法论进行辩护，随后试图解释 18 世纪文化运动的原因，在这一时期所发生的决定性的变化是：人们不再感到如果没有上帝就不能理解他们生命的精神方面，主体自身的理性力量以及情感愿望成为上帝之外的替代性的道德根源。在领读结束之后，与会学者就“家庭”、“卢梭为什么如此重要”、以

及“‘生活作为故事’中的‘故事’如何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第二天的阅读由伍伟亨老师领读的第 19-20 章而结束。第 19 章《激进的启蒙运动》着重介绍激进的启蒙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将伦理学纯粹建立在功利基础上，拒绝自然神论的构成性的善，拒绝天意秩序。面对天意秩序观的失落，泰勒认为，尼采和休谟提供了某种可能的回应，自我探索的目的不是分离式的控制，而是约定，与我们的本性妥协，我们拒绝众神不是为了成为分离式自我的塑造者，而是为了能够按照本来面目毫无恐惧地理解自身的生活。第 20 章《作为根源的本性》介绍了十八世纪后反理性主义的自然神论和自然主义的运动，包括浪漫主义和康德。卢梭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康德追随卢梭，依据自由和道德的相互依赖来规定道德的向度，康德给予启蒙运动思想的一个中心假定——理性的增长伴随着仁慈的加强——提供了明确清晰的基础。领读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现代文明中出现的精神危机：理性的衰败”、“康德的德福一致”、“卢梭的良心如何抵抗堕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工作坊第三天的阅读由伍伟亨老师领读的第 21 章而开始，这也是本次工作坊阅读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第 21 章《表现主义转向》由浪漫主义的思想出发，提出对重大意义意识来自于内部，这是一种内在的冲动和确信，而以本性为根源的哲学，在道德生活中给予情感以核心和绝对的地位，正是通过情感我们获得了深刻的道德。泰勒认为，把本性作为内在根源的观念伴随着人类生活的表现主义观点，表现主义的主体是真正具有内在深度的，现代自我不再仅仅由分离式的理性控制来定义，而且也由这种新的表现的自我阐述能力来定义，这种能力从浪漫主义时期以来就被归结为创造性想象。领读结束后，与会学者就“浪漫主义”和“启蒙理性”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最后，由瞿旭彤老师主持，参会学者对此次工作坊活动做出了总结和展望。大家纷纷表示收获颇丰，既有关于对泰勒《自我的根源》一书的深入理解，也包括对与之相关的哲学史内容的回顾和了解；以如此密集和深入的方式阅读，从各自的视角表达不同的意见和想法，并且在激烈的讨论碰撞思想的火花。与会学者认为，连续两天密集的会议成功地营造出了良好的学术讨论氛围，并且表达了继续参与的强烈意愿。最后，瞿老师向所有参会学者以及学生表达了衷心的感谢。



科研成果

2017 年第三季度中心主要科研成果

- [1]吴向东. “四个伟大”: 新的发展阶段的行动纲领[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9-07(001).
- [2]李祥俊. 儒家德福统一之实现路径析论[J]. 河北学刊,2017,37(04):10-16.
- [3]刘成纪. 重建中国社会早期书画一体关系的可能性及当下存疑[J]. 河北学刊,2017,37(04):79-85.
- [4]严春友. 心之存在的证明——罗蒂后现代心灵观批判[J]. 河北学刊,2017,37(05):12-21.
- [5]周凡,曹江川. 论卢卡奇对青年黑格尔劳动概念的分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04):86-92.
- [6]王蓓. 正义与关怀之间:当代道德教育的另一种可能[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05):51-57+157.